

面对院士帽的诱惑,官员应该主动避嫌

权力谨守边界,远离其他各种社会资源的争夺,这应该是基本的行政伦理,但现在很多官员热衷于钻营学术界、意图名利双收来看,这种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赢者通吃”现象已见端倪,整个社会不可不对其保持最大程度的警惕。

>> 头条评论

□ 特约评论员 赵勇

中国工程院发布2011年度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引发了巨大争议。

争议集中在名单上的高官和央企高管候选人身上——在工程管理学部44名候选人中,近半来自央企和政府官员,如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原中石油副总胡文瑞等。(5月26日《京华时报》)

很多人质疑评选标准,认为这是院士官僚化的表现(很多央企高管其实也是官员),但工程院学部工作局一位工作人员却称:现任企业高管、政府官员、大学校长等职,并不能

否认其以前从事过科学技术工作,且目前不少企业老总仍在承担部分科研工作,掌握前沿的工程技术,故不因职务身份就将这些人拒之门外。也有一些网友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没什么不对。

官员是不是不能当选代表中国最高学术荣誉的两院院士?这是争论的核心点。答案其实很明确——当然不能。建议那些支持官员当院士的人去看看那些科研发达的国家,看看有没有现职官员因为科研成果成就获奖的。院士这个称号,是对一个人科研学术成就的褒奖和肯定。我们都知道,搞科研和学术,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官员呢?精力都在行政事务上,哪有什么精力来搞学术研究?

逻辑上来说没有什么精力投入科研的官员大量成为院士候选人,这当然会给人“权力通吃”的联想,否则的话,你就无以解释一个人可以既做好行政事务又在科研上取得突出成就,除非这个人有分身法。

“学而优则仕”可以,因为你没有掌握公共资源,你的能力是纯粹的;但“仕而优则学”就不行了,作为官员,你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拥有比普通人大得多的沟通能力,谁能证明你的能力是纯粹的呢?简单来说,谁能证明你的论文不是靠官大一级压死人才能发表的呢?选择仕途,就意味着你要舍弃一些东西,比如比普通人少得多的个人隐私,这是符合权力和权利制衡原则的——你手握大量公共资源,在获取

权力的时候,必然要相应地舍弃一些个人的权利,否则的话,权力膨胀就失去了基本的制衡和监督。对于那些搞科研出身的官员来说,选择仕途,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在科研上登顶的机会,因为你没那个精力,并且做好行政工作才是你的分内之事。既想仕途通达,又想成为科研领域的权威,哪有这样两全其美的事?

在质疑官员获选人的声音中,很多人提到了院士官僚化的问题,认为学术自身丧失了底线,丢掉了远离权力的起码尊严。这样的质疑当然是有道理的,学术界的自我矮化和自我行政化,的确是很多领域泛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术界要有自己的操守,远离权力就是其

中最重要的一条。但回过头来想想,把责任大部分推到自己身上,恐怕有失公允。造成学术界官帽乱飞的更重要原因,是很多官员没有主动避嫌的意识。这个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资源,行政权力是一种资源,话语权是一种资源,学术界的院士荣誉也是一种资源。作为官员来说,其本身已经通过行政权力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并且由于行政权力的强势,他们在其他社会资源面前,也比其他群体有着更强的竞争力,当然也应该有更严格的边界——一个普通人可以言者无罪,一位官员就不能脱口而出“老百姓就不能脱口而出”“老百姓的昏话”。如果对官员在争夺其他社会资源方面没有严格

的遏制,那么,“赢者通吃”的局面就会形成,基本的社会公平就会消失无踪。权力谨守边界,远离其他各种社会资源的争夺,这应该是基本的行政伦理,但现在很多官员热衷于钻营学术界、意图名利双收来看,这种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赢者通吃”现象已见端倪,整个社会不可不对其保持最大程度的警惕。

当前社会的泛行政化倾向之所以越来越明显,我们之所以深陷官本位不能自拔,原因即在于没有边界的行政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的肆意争夺,如果任由权力在这条路上狂奔下去,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社会除了官帽乱飞和钻营权力之外,早已经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 世风眉批

密码厕所

笔者是一名职业律师,前不久到某县交警大队办案,发现该县交警队装修一新,服务大厅更是富丽堂皇,“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人民服务”等标语十分醒目,值班民警服务态度良好,深感欣慰。

办案期间,笔者一时内急,却发现服务区域内的卫生间铁将军把门,锁头还是新的。转到办公楼一看,更傻眼,装修后的卫生间不仅上锁,而且是电子密码锁!幸好遇见办案警官,在其带领下,用内部卡刷开。审视卫生间,发现果然上档次,洗手液、香皂、擦手纸、厕纸、毛巾一应俱全,完全是星级宾馆的标准,难怪要安装密码锁。只是这么豪华的设施完全是对内服务,一道密码锁就把市民拦在了门外,出来再看那墙上的标语和民警的笑脸就觉得不是刚进来时的感觉了。(孔祥民)

博客作业

同事的儿子上二年级,他学校里新建了一个博客群,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每天要在博客群上发一篇一百字左右的日志。可二年级的学生识字不多,在电脑上打字又比较生疏,但老师布置的任务不得完成,只好由同事代劳,结果本该由学生完成的博客作业渐渐地成了家长作业。得益于科技进步,出现了网络作业,教师省事不少,但责任心不该因此减少。无论教学条件怎样,教育必须用心。(侯升明)

官威不再

单位上的老领导马上就要退休了,平时一向严肃的他近来像变了个人,见人有笑容,也开始主动跟下属打招呼了。这让平时对他敬畏有加的年轻同事有了恋恋不舍的感情,同时也感叹如果他平时也这样平易近人,那该多好。如果每个领导都放下官威,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并不难,而官气十足,拒人千里的领导又怎么能奢求群众对他敞开心扉。(贺明)

■ 本栏目投稿信箱:
shifengmeip@hotmail.com

其实市民也需要了解停车费的民意

现场原声

□ 崔滨(本报记者)

25日是济南市停车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民意的截止日期。这一天,济南市物价局和公安局的负责人通过12345政府热线,继续向全体市民征集施行区域差别化停车收费的意见和建议。在征求意见之后,有关部门是否应该向社会公布市民的集中诉求,以及在后续的政策制定中体现市民意愿呢?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25日上午,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与数十位市民进行了交流,同时表示将在停车收费标准的最终确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市民意见。

出行是否通畅,停车是否方便,关乎市民的生活质量,济南市相关部门在制定收费标准和管理措施时,能充分考虑到市民的意见,尽可能地听取更多市民的建议,体现出了民主科学的“公开立策”精神。但是针对停车费的民意又不只是市民对管理部门的意见表达,更多的市民希望借此机会了解彼此不同的看法,这也有助于市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所以,相关部门在了解民意之后是否可以考虑,适时将民意公之于众,让市民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虽然13日就通过多种渠道向全社会征集停车收费管理办法,但一直到25日意见征集截止,市民仍不清楚何时公布意见征

集内容;至于停车收费标准如何确定、政策的制定如何体现市民的诉求,多数市民也不甚明了。

在25日的政务在线交流中,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济南停车收费标准的确定,将借鉴北京等外地城市的成熟经验。据北京媒体报道,在北京市的停车收费标准制定过程中,有关部门召开交通、社会、经济、价格等方面的专家及停车企业、商业企业、普通市民参加的座谈会二十多次,并对征集到的1022位市民的3000余条意见和建议内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这些经验都值得济南市借鉴,以民主透明的程序制定停车收费标准,还需要进一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关乎广大市民的利益,应当让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充分的利益博弈,唯有如此,政策制定者才能了解大多数市民的真实想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的片面性。

同时,在民意的征集和采纳过程中,深入、全面地披露市民关心的政策导向和焦点,更能够有效消除市民的疑惑和误解。如果政府部门因为担心引发争议,对公共政策采取简单的处理方法,反而有可能忽略需要讨论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而影响政策实施运行的效果,带来社会和经济损失。

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民众的表达权和知情权缺一不可,让市民全面充分地参与政策制定,既要让政府部门了解最广泛的民意,还应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民意采集的程序和结果,这样才能赢得更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 言论观察

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对于维稳大有好处。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群体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所在”。

文章说,在今天的中国,能听到各种声音。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

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

听见与被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

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

心态,导致矛盾激化。

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文章指出,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群体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 众论

虚假问责,权力毫无羞耻感

近日,河南洛阳推行行政问责中出现了尴尬一幕:两名作为领导干部被问责免职的“环卫队长”,竟是普通通通的环卫工人。洛阳市优化办5月23日发布的通报证实,该市涧西区、瀍河回族区上报的个别被问责人员身份不符,存在虚报和混淆职务后予以“免职”的造假行为。(5月26日《工人日报》)

权力没有羞耻感,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没有羞耻感的权力,必须被套上国家法律和公民监督的笼头,否则它就会横行无忌,不把任

何东西放在眼里,普通职工“被领导”,代替真领导接受问责和处罚,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事后,弄虚作假者也受到了包括党内警告和停职检查在内的党纪政纪处罚,虽然这是他们咎由自取,但依笔者的看法,这样的处罚还是过轻了,不足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必须让这些玩弄权力于股掌、也玩弄上级与民意于股掌的官员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才能让更多人吸取教训,尊重自己手中的权力和民意。(苑广阔)

广东电信“茅台门”不能自说自话

近日广东电信汕头分公司的16位员工在网上发帖实名举报该公司大批购买茅台酒供内部高管吃喝的内幕消息,网帖上不但有签名,还有手印和手机号码。广东电信称举报系虚构捏造,并表示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5月26日《京华时报》)

试问,调查组是怎么查的?从报道中根本看不出调查组对被举报方有怎样的查证行为,只看到调查组找到某位举报者,问其举报是否其本人所为,并向其解释了茅台酒的用途。这算什么调查?分明是替被举报者打掩护,对举报者进行封口恫吓。而且调查组给出的证据根本

算不得证据,且针对此事的声明:该公司与茅台酒厂有着良好的企业信息化合作关系,而购买的一些茅台酒也被用于市场业务拓展、客户关系维系和外事活动云云。此是万能说辞,放在上个月曝光的广东中石化“天价酒”事件中也是十分合适,毫无说服力。

公众需要的是经得起查证的真凭实据,能够证明这些茅台酒确系用于业务拓展,而没有私用。这需要详细的茅台酒厂提供的销售发票和酒店提供的消费发票等为证,然后一笔一笔公之于众,接受群众监督,由不得调查组自说自话。(王学进)

儿童节不是家长的“捐款节”

“六一”前夕,福建省泉州市一些幼儿园家长反映,同属泉州市蓝天幼教集团旗下的泉州市丰泽区蓝天幼儿园、泉州市第三幼儿园及南安市洪濂第二中心幼儿园,借“六一”之名向家长发动捐款,并将写有捐款名单的大红纸张贴在教室墙壁上“公示”。(据5月26日《人民日报》)

儿童节本是孩子喜庆的节日,现在也有些变味了,不但家长要向学校捐款,还要向老师送小礼物。学生家长有没有捐款,是否给老师送礼,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小红花”和“三好学生”的评选。

儿童节为何就成了家长的“捐款节”呢?首先,还是学校、幼儿园资金紧张的问题。

我们有些地区在教育上政府投入资金不足,造成学校向社会“化缘”,以弥补资金短缺的问题。其次,学校、幼儿园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以“节”生财。儿童节、教师节成了一些学校向企业单位、学生家长“创收”的好时节,然后改善老师的福利。

当然,一些单位和个人向学校主动捐款是可以的,我们国家历来就有资助办学的好传统,但募捐上来的资金也要加强管理,不能变成老师“福利金”。而一些学校、幼儿园借节日搞活动的名义,向家长发动捐款必须被禁止,否则经济问题还是小事,一旦污染了少年儿童的心灵则造成社会未来的隐患。(徐志翔)

■ 本版投稿信箱:zhangjinqing@qlwb.com.cn